

基于流动性视角的失地农户收入变化分析*

——来自襄阳和昆明的证据

丁士军¹ 杨晶¹ 陈玉萍²

摘要：本文利用湖北襄阳和云南昆明农户调查数据，考察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户的收入流动性，并采用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从家庭禀赋和风险冲击视角，分析失地农户收入流动性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第一，不同类型的家庭禀赋因素对失地农户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越低，收入向下流动的可能性越大；初始收入位置越高，收入向下流动的概率越大；经济支持户数越多，农户收入越可能向上流动。第二，征地后农户经济风险和健康风险对农户收入流动性具有明显的冲击。从风险防范因素来看，参加“土地换社保”项目的失地农户收入更容易发生向上流动。因此，应该增强失地农户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防范农户经济风险和健康风险，降低农户异质性对收入流动性的影响。

关键词：征地 家庭禀赋 风险冲击 收入流动性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收入水平与收入结构是农户经济分析中的重要方面，也是研究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失地农户问题的重要内容。伴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和城乡土地制度的纵深改革，失地农户面临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和隐含的阶层固化问题更加严重。从动态的视角（征地前后）考察失地农户的收入流动性，剖析失地农户收入流动性现状和影响因素，可以为更加全面地认识失地农户收入的动态变化提供新的视角，也能为政府部门制定促进失地农户生计发展政策提供基础证据。许多研究关注了家庭特征对失地农户收入变化的影响（例如楼培敏，2005；黄建伟、喻洁，2010；史清华等，2011），一般认为，失地农户收入变化主要表现为非农收入水平和结构的变动。

失地农户收入及其收入流动性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史清华等（2011）基于上海 7 村 2281

*本文研究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土地换保障’背景下失地农户的生计重建：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的分析”（编号：71173239）和“生命周期、生计策略与农户贫困动态性”（编号：71273281）的资助。感谢审稿人为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但文责自负。

户农民的调查显示，多元的就业途径、多源的财产性收入和多重的社会保障等是许多被征地农民收入上升的重要原因；崔宝玉等（2016）利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估计了土地征用对失地农户收入的影响，认为土地征用具有农户总收入效应和非农收入效应。张科静等（2014）和丁士军等（2016^a）利用家庭微观调查数据，验证了收入流动与家庭禀赋因素的相关性，证实了不同收入层次失地农户收入流动性影响因素存在差异，认为那些收入更容易向下流动的较低收入农户往往具有户主没有外出务工、兼业程度比较低、劳动力人数较少、失地程度较高、遭遇过经济风险或区域自然灾害等特征。当前研究增进了对失地农户收入及其收入流动性的认识，但目前还缺乏从家庭禀赋及风险冲击视角对土地征收影响机制的探讨，更缺乏关于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户收入流动性问题的研究。

风险一直是收入分配研究领域的热点主题之一。本文利用实地调查数据，在描述收入流动性现状的基础上，将风险因素引入模型，从家庭禀赋和风险冲击对失地农户收入流动性影响的视角，分析失地农户收入流动性问题。本文研究主要回答三个问题：第一，各种家庭禀赋因素对失地农户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有何差异？第二，不同类型的风险因素会对失地农户收入流动性造成怎样的冲击？第三，当前改革和政策设计应该从哪些方面帮助失地农户提高收入。本文余下部分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为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第三部分为数据来源和收入流动性现状描述；第四部分为失地农户收入流动性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第五部分是对收入流动性影响因素计量结果的解释；第六部分是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一）理论基础

农户模型为分析农户生产和消费行为提供了理论基础。农户在面临生产、时间和预算等约束下极大化其效用。在完全市场条件下，农户的生产决策和消费决策是相互独立，农户首先在生产（技术）约束下最大化利润，然后在标准的预算约束条件下最大化其效用。然而，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是不完善的，生产和消费决策无法独立进行，而是同时作出的。农户的福利由其生产决策决定，而生产决策取决于家庭的偏好及禀赋条件（参见普兰纳布·巴德汉、克利斯托弗·尤迪（2002）关于农户模型的讨论）。

在农户收入决定模型中，农户效用最大化受到农户纯收入、工资收入、时间约束和农业生产要素投入成本的约束。各类生计资本（家庭禀赋）起着核心作用，区域、风险以及制度等外部因素也起着重要作用（史清华等，2011；丁士军等，2016^a）。对失地农户而言，征地及其补偿收入既是制度带来的外部影响因素，也是导致农户核心生计资本发生改变，从而影响收入的关键变量。区域因素也会对农户收入流动性产生影响，例如区域内的地理条件、市场条件、自然条件等都会影响农户生计策略，从而决定农户的生计结果及其在群体中的收入阶层（王洪亮，2009；严斌剑等，2014）。通常地理条件和市场条件越好，失地农户更加容易和更快地重建其生计策略，从而创造收入；农户的劳动力数量和质量越高，其家庭劳动生产率通常越高，从而收入越高。一般来说，已有的资本积累和失地过程中所得的征地补偿共同构成了农户总的经济资本，农户拥有的经济资本越富足，农户

越容易利用拥有的资本进行非农生产从而获得收入。对失地农户而言，土地是其重要的生计资本，他们通常完全或者部分失去土地，失去部分土地的农户可以继续利用土地进行农业生产活动，但是，部分土地的保留又意味着失地农户会获得较少的经济补偿，因此，其对生计结果的影响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和实证检验。

（二）分析框架

本文参考陈传波（2005）、丁士军等（2016^b）的研究，构建农户收入变化分析框架。由于农户失地前和失地后的时间区间较小，因此假定失地前后的风险冲击和区域因素是不变的；失地会直接导致农户的家庭禀赋变化，因此家庭禀赋是动态的（参见图 1 分析框架）。农户在征地前生计资本水平和结构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会对征地后农户生计策略产生重要影响。制度变迁和风险等因素是外在的背景因素，对整个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和生计结果等都有外在的影响。在这样的生计环境中，遭受不同风险冲击的“理性”农户会基于家庭禀赋及偏好做出生计决策。农户是集风险与脆弱性于一体的特殊群体（陈传波，2005），尽管农户自身采取了种种风险应对策略，但不同家庭禀赋及偏好的农户的生计决策或风险应对策略存在差异，因此农户收益的变化存在异质性。从动态的视角（征地前后）来看，收入差距随之产生，农户收入位置也可能会随着时间变化发生改变。失地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差异会影响收入流动，从而影响农户生计状况和福利状况。生计结果又会对农户的生计资本产生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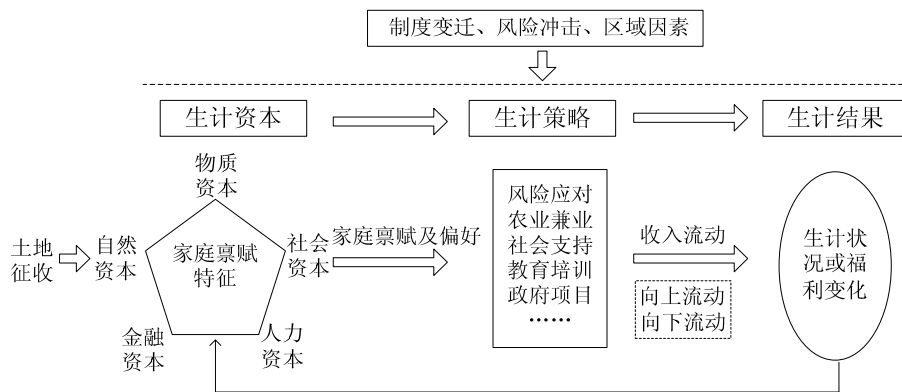


图 1 分析框架

在分析失地农户收入流动性问题时，首先，将农户收入流动性归类，例如收入上升的农户和收入下降的农户等。将被解释变量设为失地农户收入流动类别，在此基础上，对不同收入流动类别的分析能够反映失地农户收入流动状况。其次，从家庭禀赋的变化、风险冲击两个方面选取分析农户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因素（解释变量）。失地农户收入流动性受到很多方面的影响。在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完全的情况下，农户行为除受其自身家庭禀赋的限制外，还受社会经济条件和政府政策干预的影响，特别是要面对着各种各样的风险冲击，从而不同属性农户的收入变化是存在差异的。因此，农

户家庭特征差异、风险冲击都会影响农户收入流动性，造成农户收入分化。在此基础上，本文设定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家庭禀赋和风险冲击对失地农户收入流动性的影响。

三、数据来源和收入流动现状描述

（一）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土地换保障’背景下失地农户的生计重建”研究课题组在2013年组织的农村调查。调查基于分层随机抽样的原则，按照经济发展、地理区位和人口分布等因素选取湖北省和云南省进行研究。为便于农户回忆和比较征地前后的信息，首先，课题组分别在选定的主要地级市（包括襄阳市和昆明市）中选择最近3~5年来有土地被征收的农村地区作为研究样本区域；然后，在各个区域内选择2~3个征地较为频繁的经济开发区域；最后，在此区域内随机选取村庄和失地农户进行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农户收入指的是农户纯收入，包括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等。其中，经营性收入既包括本地或外地个体小买卖、加工、运输等非农经营性收入，也包括种植业和养殖业等农业性收入。本文选择湖北襄阳市和云南昆明市的共计429个失地农户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其中，湖北省的被调查农户分布在襄阳市襄城区近郊因征地而搬迁集中居住的白云村（63个）、毕庙村（137个）和尹集村（127个），云南省的被调查农户分布在昆明市盘龙区上坝村（50个）、中坝村（52个）。

（二）失地农户收入流动性分析

许多研究将单一年度的农户收入数据作为收入分组的依据，采用截面数据分析农户收入变化。这种以农户收入静态位序变化为标准测量收入流动性的方法，只能得出单一时间维度下的农户收入静态位序变动情况，忽略了不同时间维度下（例如征地前和征地后）农户收入动态位序的变化特征。在以往相关研究（例如章奇等，2007；吴海涛、丁士军，2013；丁士军等，2016^a）的基础上，本文首先将农户征地前和征地后两个阶段的收入数据按照物价指数进行折算，然后进行混合排序得到征地前、后两个时期的农户收入分组（低收入组、中等收入组和高收入组）和组内收入等级（共7个等级），具体如表1所示^①，并采用收入转换矩阵和交互分析的方法（表2、表3）对收入流动性进行测算。

在收入流动类型划分研究（丁士军等，2016^a）的基础上，本文把失地农户收入流动分为“上升”“上稳”“下沉”和“下稳”四个类别。“上升”类别表示征地后农户从低收入组流向中等收入组或高收入组，以及从中等收入组流向高收入组；“下沉”类别表示征地后农户从高收入组流向中等收入组或低收入组，以及从中等收入组流向低收入组；“上稳”类别表示征地后农户收入组不变，但组内

^①将农户征地前收入和征地后收入合并在一起得到新的收入数据。对新的收入数据进行排序并分为3个收入组，再对各收入组按照收入进行等级划分，得到农户收入的3个收入组共7个等级标准。按照这7个等级标准，分别对农户征地前的收入和征地后的收入进行等级划分，得到农户征地前所属的收入等级和征地后所属的收入等级。失地农户征地前后的收入如果处于不同的收入等级，说明失地农户存在收入的动态位序变化。将农户在收入等级中所处的位置进行比较就能够很好地反映征地前后农户收入等级的动态变化。

收入等级有所提升；“下稳”类别表示失地农户收入组不变，而组内收入等级不变或下降。

表 1 显示，不同收入组失地农户的比重及其流动方向的变化存在差异。征地后最低收入等级农户比重的增加幅度最大，为 10.49 个百分点，中等收入等级农户比重变化幅度最大，农户比重下降了 14.22 个百分点。征地后低收入组失地农户的总比重明显提高了，说明低收入组农户数量增加了。两两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中等偏下收入等级农户比重减少了但其收入位置变化并不显著，中等偏上收入等级农户比重增加了且其收入位置变化显著，最高收入等级农户比重小幅下降且其收入位置变化也显著。这说明，征地前后不同收入组失地农户收入的变化是存在差异的。

表 1 不同收入组农户比重与变动方向的交互分析 单位：%

	低收入组		中等收入组			高收入组	
	最低	较低	中等偏下	中等	中等偏上	较高	最高
征地前	11.19	12.35	21.45	20.51	17.72	8.86	7.92
征地后	21.68	10.72	20.05	6.29	20.28	14.22	6.76
变动方向	正	负	负	负	正	正	负
t 检验	显著	显著	不显著	显著	显著	显著	显著

注：收入组的划分方法是：首先，将农户征地前、后的家庭纯收入合并在一起从低到高排序，并根据排序结果按照 10%、10%、20%、20%、20%、10%、10% 的间距，把农户分别归入低收入组（最低、较低）、中等收入组（中等偏下、中等、中等偏上）和高收入组（较高、最高）3 个组共 7 个等级，对每个等级农户收入计算得到收入中位数。然后，按照同样的方法，将征地前和征地后两个时间点的农户收入数据分开，分别得到征地前、后农户的收入等级。

收入转换矩阵是研究收入流动性的很好的分析工具（Fields and Ok, 1999），可以分析考察期内不同阶层失地农户在同一群体收入分配中收入位置的变化，通常使用惯性率等指标。收入流动惯性率能度量各收入组失地农户在分析时段内收入分配中保持同一收入位置的概率，是收入转换矩阵对角线上元素的算术平均值。表 2 结果显示：第一，不同收入组失地农户收入流动性存在差异，相对征地前收入位置较低的农户而言，征地前收入位置越高，农户保持自身收入位置的可能性越大，但也意味着这部分收入阶层的失地农户更缺乏流动性，例如，最高、较高和中等偏上收入等级农户保持自身收入位置的概率分别是 67.65%、50% 和 40.79%。而中等和较低收入等级农户收入位置稳定性弱，说明其收入流动性反而更强。第二，征地后，被调查农户的收入流动惯性率为 0.371，略高于张立冬等（2015）测算的同时期全国水平^①。这说明，被调查地区失地农户收入流动程度相对较低。第三，失地农户向上流动概率与向下流动概率的比值存在组间差异，且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呈减小趋势。比值越大，说明收入向上流动性越强，收入流动效应越能够促进农户收入提高及经济地位改

^①张立冬等（2015）利用 CHNS 数据对 1989 年以来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进行了测算。测算结果表明，2009~2011 年间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惯性率为 0.346，低于本文样本失地农户整体的收入流动惯性率。

基于流动性视角的失地农户收入变化分析

善，指标超过 1 说明收入向上流动性好。例如，较低收入等级失地农户的向上流动概率与向下流动概率的比值为 2.90，较高收入等级农户的向上流动率与向下流动率的比值仅为 0.19。

表 2 失地农户收入转换矩阵 单位：%

		征地后农户收入位置						
		最低	低	中等偏下	中等	中等偏上	高	
征地前农户收入位置	最低	29.17	18.75	18.75	12.50	6.25	12.50	2.08
	低	18.87	26.42	24.53	7.55	16.98	5.66	0.00
	中等偏下	18.48	18.48	40.22	10.87	7.61	2.17	2.17
	中等	31.82	3.41	22.73	5.68	28.41	7.95	0.00
	中等偏上	23.68	1.32	7.89	1.32	40.79	25.00	0.00
	高	13.16	5.26	2.63	2.63	18.42	50.00	7.90
	最高	2.94	0.00	0.00	0.00	14.71	14.71	67.64
	合计	21.68	10.72	20.05	6.29	20.28	14.22	6.76

表 3 描述了失地农户收入流动分化状况。低收入组失地农户收入流动状况为“上升”的概率较大，中等收入组失地农户“下沉”的可能性较大，高收入组失地农户更倾向于“下稳”。这种情况说明，不同收入组失地农户的收入流动性存在差异。结合表 2 数据分析可知，尽管征地后仍有一部分农户稳定在低收入组，其收入流动性表现为“下稳”，但是，农户收入等级越低，收入流动性越强，也更容易“上升”到更高收入组。尽管中等收入组农户更容易留在本收入组，但也有部分农户流动到高收入组(比例为 14.29%)，并且相当一部分中等收入组农户“下沉”到低收入组(比例为 31.50%)。部分高收入组农户虽然也保持了较大的收入流动惯性率，但其收入位置巩固的难度较大，30.77%的高收入组农户向下流动，从高收入组“下沉”到低收入组和中等收入组。

表 3 失地农户收入流动分化状况 单位：%

征地前	征地后			
	上升	上稳	下稳	下沉
低收入组	61.54	12.82	25.64	0.00
中等收入组	14.29	23.44	30.77	31.50
高收入组	0.00	12.82	56.41	30.77
合计(所有样本)	20.28	19.58	34.50	25.64

注：由于低收入组和高收入组已经是收入组划分的临界组，这意味着不能有更低收入组“下沉”，也不可能有更

高收入组“上升”。

四、失地农户收入流动性影响因素分析

(一) 计量经济模型设定

本文考察家庭禀赋及风险冲击两个层面解释变量对失地农户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失地农户收入流动类别（被解释变量）有4种分类，上升=1、上稳=2、下稳=3和下沉=4，失地农户收入流动类别是一个多分类有序变量，因此，选择有序 Logistic 模型进行分析较为合理。

设被解释变量为 Y_i ，表示收入流动状况的4种分类，它反映了农户收入位置在考察期内的变化状况，该变量取值越大，表示失地农户的收入流动状况越差。本文计量模型为：

$$Y_i = \alpha + \beta_1 X_i + \beta_2 R_i + \beta_3 C + \varepsilon_i \quad (1)$$

(1) 式中， α 为常数项， X_i 为一组家庭禀赋因素， R_i 为衡量风险因素， C 为区域控制变量， β 为解释变量的系数， ε_i 为随机扰动项。

(二) 变量说明

1. 家庭禀赋因素。首先，人力资本禀赋可以通过影响农户劳动报酬高低来影响失地农户收入及其流动性。本文选取“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户主是否参加过技能培训”来衡量农户人力资本状况。一般而言，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户的人力资本越强，收入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更大；户主参加过非农技能培训的农户，其收入流动性会更倾向于向上流动。其次，初始收入状况、财产性收入比重的变化可以反映农户的经济资本。经济资本越多，收入向上流动的概率越大。失地农户可能面临着社会关系的变迁和重组，本文引入“经济支持户数”来反映农户的社会资本状况。在问卷设计中，本文研究通过设定“假如您家发生经济困难需要资金，你认为能够给予经济支持的有多少户？”这一问题来反映农户可以获得的社会支持。发生经济困难需要资金时能够给予经济支持的亲戚和朋友的数量越多，农户的社会资本就越强。此外，土地的多少关系到农户经营性收入的变化，会对农户的收入流动性产生影响，因此，本文选取“失地比例”来衡量失地农户家庭的自然资本。

2. 风险因素。自然风险（干旱、暴雨、雪灾和动植物病虫害等）会影响农户的生产活动。一般而言，遭受自然风险的农户更可能收入向下流动。市场价格风险在宏观层面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当农产品市场价格或生产资料价格波动较大时，价格波动会失地农户收入和消费产生负面影响，相应的失地农户收入流动状况可能变差。农户经济风险用来分析农户无非农就业机会、自营工商业亏本、大的教育开支、食品不能自给等与经济相关的事件对农户收入位置变化的影响。以上事件只要有一件发生，即为农户遭受了经济风险。健康风险也是影响农户收入流动性的重要因素，例如发生大的医疗开支、丧失劳动能力等，遭受风险冲击后失地农户的收入流动性会变差。风险防范因素指农户是否参加“土地换社保”的项目，参加了这类保险的农户，短期内经济补偿相对较少，但医疗和养老等方面的长期保障或抵御风险冲击的能力可能会更强。

3.控制变量。本文在模型中还设置了农户类型和地区变量两个控制变量。按征地前农业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划分农户类型，分别为纯农业（ $\leq 10\%$ ）、农业兼业（ $10\% \sim 50\%$ ）、非农兼业（ $50\% \sim 80\%$ ）和非农业（ $>80\%$ ）4 种类型。征地前的农户类型能够较好地反映农户对农业性收入的依赖程度，但由于征地后农业活动受到巨大影响，因此兼业程度越低，农户的收入状况越容易受到冲击。地区变量是反映农户所在地区的虚拟变量。

表 4 变量说明及其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名称	变量解释与赋值	均值	标准差
家庭禀赋	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	按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划分：小学以下=1，小学=2，初中=3，高中=4，大专及以上=5	1.99	0.98
	户主是否参加过技能培训	户主是否参加过非农技能培训，是=1；否=0	0.06	0.24
	初始收入位置	征地前收入状况，低收入组=1；中等收入组=2；高收入组=3	2.00	0.60
	财产性收入比重变化	征地前后财产性收入占总收入比重的变化（百分点）	0.06	0.24
	经济支持户数	农户遭受困难时可提供经济支持的户数（户）	7.73	9.75
	失地比例	被征收土地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比重（%）	0.78	0.27
风险因素	自然风险	征地后自然风险（干旱、暴雨、雪灾和动植物病虫害）是否发生，是=1；否=0	0.27	0.45
	市场价格风险	农产品市场价格或生产资料价格是否发生较大的波动，是=1；否=0	0.40	0.49
	农户经济风险	无非农就业机会、自营工商业亏本、大的教育开支、食品不能自给等经济风险是否发生，是=1；否=0	0.60	0.49
	农户健康风险	农户是否发生大的医疗开支、丧失主要劳动力风险，是=1；否=0	0.40	0.48
	风险防范因素	农户是否参加“土地换社保”项目，是=1；否=0	0.13	0.34
控制变量	地区变量	农户所在地区，襄阳=1，昆明=0	0.76	0.42
控制变量	农户类型	纯农业=1；农业兼业=2；非农兼业=3；非农业=4	2.06	0.92

五、收入流动性影响因素计量结果的解释

（一）家庭禀赋因素对失地农户收入流动性的影响

根据前面的分析，本文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从人力资本禀赋来看，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失地农户收入流动性有显著影响。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越低，收入流动性为“下沉”的概率越大。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越高，人力资本存量越大，非农兼业收入增加可能性越高，失地农户越容易实现收入向上流动。而人力资本较弱的失地农户，工作机会的获取能力不够，特定职业进入门槛会阻碍其就业（周兴、张鹏，2014）。因此，人力资本积累对失地农户收入向上流动的影响

比较显著。户主参加过非农技能培训也会提高失地农户人力资本水平，但是，该解释变量在模型中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的原因是技能培训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在短时间内无法体现在收入中，这可能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从经济资本禀赋来看，初始收入位置和财产性收入比重变化对失地农户收入流动性存在显著的影响。相对征地前低收入组失地农户而言，征地前中等收入组失地农户和高收入组失地农户的收入流动性更倾向于“下沉”。这说明，初始收入位置越高，失地农户收入向下流动的概率越大。可能的解释是，尽管高收入阶层失地农户在经济地位上具有一定的收入位置稳定性，但初始收入位置越高，收入位置变动的失地农户向中等、低收入阶层集聚的可能性越大，因此，其向上流动性并不明显。相对来说，处于较高收入位置的失地农户的收入更容易向下流动，这与失地农户收入转换矩阵呈现的结果一致。被征地后，大量低收入组和中等收入组失地农户“被迫”由农业就业向非农就业转变，家庭工资性收入明显提高了，失地农户家庭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发生了变动，从而他们可能更容易进入邻近的更高收入位置。因此，低收入组失地农户更易发生向上流动。

此外，财产性收入比重增加与收入向下流动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财产性收入比重每增加 1 个百分点，失地农户收入向下流动的概率将会降低 63%，这与史清华等（2011）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本文研究的样本地区襄阳市樊城区和昆明市盘龙区均位于近郊地带，紧邻市区的优越地理位置可以为失地农户创造房屋出租等增收机会，并且，征地货币补偿的方式为失地农户创造存款利息等收入。因此，较征地前而言，财产性收入比重的提高显著增强了失地农户的向上流动性。

从社会资本禀赋来看，经济支持户数对失地农户收入流动性具有显著的影响。经济支持户数越多，失地农户越可能收入向上流动。经济支持户数增加，失地农户的社会资本状况更好，这意味着失地农户遭受风险冲击时获得亲戚或朋友支持和帮助的可能性更大。但是，征地可能会导致失地农户社会关系变迁和重组，传统以地缘和血缘为中心的社会资本产生扩散效应并可能被逐渐弱化，因此，失地农户收入向上流动的效果也会受到影响。方程 3 中这个变量的显著性程度较低也证实了这一点。

表 5 失地农户收入流动性影响因素的 Logistic 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方程 1 (家庭禀赋)	方程 2 (风险因素)	方程 3 (全部变量)	
	回归系数	回归系数	回归系数	风险比
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 (参照组: 小学以下)				
小学	-0.979**	—	-0.802**	0.448
初中	-1.053**	—	-0.914**	0.401
高中	-1.575***	—	-1.417***	0.242
大专及以上	-1.677***	—	-1.377**	0.252
户主是否参加过技能培训	0.286	—	0.297	1.346
初始收入位置 (参照组: 低收入组)				

基于流动性视角的失地农户收入变化分析

中等收入组	2.547 ^{***}	—	2.585 ^{***}	13.264
高收入组	3.244 ^{***}	—	3.302 ^{***}	27.177
财产性收入比重变化	-1.018 ^{**}	—	-0.993 ^{**}	0.370
经济支持户数	-0.016 [*]	—	-0.015 [*]	0.985
失地比例	0.569	—	0.534	1.706
自然风险	—	-0.101	-0.063	0.939
市场价格风险	—	-0.283	-0.151	0.860
农户经济风险	—	0.531 ^{**}	0.424 ^{**}	1.528
农户健康风险	—	0.356 [*]	0.411 [*]	1.508
风险防范因素	—	-0.363	-0.546 [*]	0.579
地区变量	1.688 ^{***}	1.873 [*]	1.421 ^{***}	4.144
农户类型（参照组：纯农业）				
农业兼业	-0.009	-0.427 [*]	-0.058	0.943
非农兼业	0.361	0.424	0.294	1.343
非农业	-0.017	-1.395 ^{**}	-0.006	0.994
有效样本	429	429	429	
Log likelihood	-479.28	-526.07	-473.30	
P 值	0.0000	0.0000	0.0000	
Pseudo R ²	0.1717	0.0976	0.1821	

注：***、**和*分别表示变量在 1%、5%和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二）风险因素对失地农户收入流动性的影响

进一步分析方程 2 结果可知，与没有遭受经济风险（农户无就业机会、自营工商业亏本、大的教育开支、食品不能自给等风险）的失地农户相比，遭受了此风险的失地农户发生了显著的收入向下流动。这说明，失地农户收入流动性受到了经济风险的冲击。经济风险会通过影响农户经济活动对其收入造成影响，低估风险或缺乏风险处理手段的农户更容易遭受风险的冲击。

健康风险也是显著影响失地农户收入流动性的重要因素。失地农户是集风险与脆弱性于一体的特殊群体，一旦发生较大医疗开支或丧失劳动能力，失地农户的收入状况将会变差，进而加大其收入向下流动的可能性。因此，健康风险对失地农户收入向下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同时引入家庭禀赋和风险类变量（方程 3）后发现，“农户是否参加‘土地换社保’项目”这一风险防范变量对农户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效果由不显著变为显著。这说明，风险防范因素对失地农户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可能是通过家庭禀赋因素起作用的。进一步分析可知，与没有参加“土地换社保”项目的失地农户相比，参加了的失地农户的收入流动性更倾向于“上升”，说明风险防范因素对失地农户向上流动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自然风险和市场价格风险对农户收入流动性的冲击并不显著。可能的解释是，失地后大部分农户的生产活动从农业向非农业转变，受干旱等自然风险的影响变弱，农产品市场价格或生产资料价格波动对农户收益的影响也降低，因此，自然风险和市场价格风险的影响并不显著。这种效应还需要进一步的检验。

此外，地区变量对失地农户的收入流动性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即与昆明地区失地农户相比，襄阳地区失地农户收入更容易向下流动。这说明，失地农户的收入流动性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地理区位对失地农户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是通过区域内资源禀赋发挥作用的。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条件、补偿安置措施和政策资源的可获得性等方面存在差异，失地农户自身的家庭禀赋条件和生计选择也会有差异，从而引致不同地区失地农户收入变化及其流动状况的异质性。

六、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利用湖北襄阳和云南昆明农户调查数据，通过分析家庭禀赋和风险冲击对失地农户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从家庭禀赋因素来看，丰裕的经济资本禀赋和社会资本禀赋对失地农户收入向上流动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初始收入位置越高，收入向下流动的概率越大，而低收入组农户更易发生向上流动；经济支持户数越多，失地农户越可能收入向上流动。人力资本禀赋变量对失地农户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存在差异，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对失地农户收入流动性存在显著的影响，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越低，收入流动性为“下沉”的可能性越大。第二，征地后经济风险和健康风险对失地农户收入流动性具有明显的冲击。从风险防范因素来看，参加“土地换社保”项目的失地农户更容易发生收入向上流动。

本文结论的政策含义是显而易见的。为了缓解失地农户风险冲击带来的福利损失，防止贫困和脆弱农户陷入持续性贫困，促进低收入农户收入向上流动，干预的政策措施应该围绕增加失地农户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防范农户经济风险和健康风险等方面开展。针对农户家庭禀赋条件的差异，实施精准的失地农户政策干预措施。同时，增加那些收入向下流动的失地农户就业机会，为其生计转型创造条件，同时提供纵向流动的公平机会，促进较低收入失地农户收入向上流动。只有降低各种风险冲击、增强农户自身素质，增加农户资产积累，才能提高农村人口应对风险的能力，降低农村人口收入向下流动的概率，保障农户福利水平的稳步提高。

参考文献

1. 崔宝玉、谢煜、徐英婷，2016：《土地征用的农户收入效应——基于倾向得分匹配（PSM）的反事实估计》，《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第2期。
2. 陈传波，2005：《农户风险与脆弱性：一个分析框架及贫困地区的经验》，《农业经济问题》第8期。
3. 丁士军、杨晶、吴海涛，2016a：《失地农户收入流动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中国人口科学》第2期。
4. 丁士军、马志雄、张银银，2016b：《被征地农户生计能力变化研究——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的改进》，《农业经济问题》第6期。

- 5.黄建伟、喻洁, 2010:《失地农民关键自然资本的丧失、补偿及其对收入的影响研究——基于七省一市的实地调研》,《探索》第4期。
- 6.楼培敏, 2005:《中国城市化过程中被征地农民生活状况实证研究——以上海浦东、浙江温州和四川广元为例》,《中国农村经济》第12期。
- 7.普兰纳布·巴德汉、克利斯托弗·尤迪, 2002:《发展微观经济学》,陶然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8.史清华、晋洪涛、卓建伟, 2011:《征地一定降低农民收入吗:上海7村调查——兼论现行征地制度的缺陷与改革》,《管理世界》第3期。
- 9.王洪亮, 2009:《中国区域居民收入流动性的实证分析——对区域收入位次变动强弱的研究》,《管理世界》第3期。
- 10.吴海涛、丁士军, 2013:《贫困动态性:理论与实证》,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 11.严斌剑、周应恒、于晓华, 2014:《中国农村人均家庭收入流动性研究》,《经济学(季刊)》第3期。
- 12.张科静、丁士军、黄朝阳, 2014:《上升还是下沉——基于收入流动性视角的失地农户收入研究》,《学术论坛》第3期。
- 13.张立冬、周春芳、曹明霞、王洪亮, 2015:《收入差距、收入流动性与收入均等化:基于中国农村的经验分析》,《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 14.章奇、米建伟、黄季焜, 2007:《收入流动性和收入分配:来自中国农村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第11期。
- 15.周兴、张鹏, 2014:《代际间的职业流动与收入流动——来自中国城乡家庭的经验研究》,《经济学(季刊)》第1期。
- 16.Fields,G.S. and Ok, E. A.,1999,“The measurement of Income Mobilit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iterature”, *Handbook of Income Inequality Measurement*, pp. 557-598, <http://digitalcommons.ilr.cornell.edu/articles/458>.

(作者单位: ¹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²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 鲍曙光)